

□ 张大雁

常书鸿，别名廷芳、鸿，1904年4月出生于浙江杭州市，是我国现代油画家、敦煌学家、艺术理论家、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敦煌学的奠基者、敦煌文化事业的开创者，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常书鸿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满族军官家庭，其祖父为清代驻防浙江杭县的“世袭云骑尉”，父亲原是黑龙江八旗工艺厂录事，信奉实业救国。常书鸿自幼爱好绘画，并随三叔父学画、填色，从小心中便种下了艺术种子。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的染织专业，学习染色和织造图案画。在校期间，参加了由著名画家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临摹国内刊物上的西方名画，并为人画像，赚取报酬，以贴补家用。

1923年毕业于后，为继续深造，1927年，带职自费赴法国留学。留学期间，他把一切时间都用在学法和绘画技术上，并考取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随后以公费生的身份在里昂美术学院专攻美术。在留学的10年间，他取得了卓越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虽然在法国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但他始终不忘报效祖国。

1935年秋，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希伯和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画册，全书约有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在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为此，他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回到了祖国。回国后，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向往着早日实现梦想。1941年12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呈交了提请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议案，1943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提案，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由高一涵、常书鸿为筹备委员会主任，郑通和、张大千、王子云、莫景椿为筹备委员。是年，常书鸿等6人以先遣人员，沿着古丝绸之路，经过几个月艰苦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敦煌莫高窟。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犹如步入仙境，心情非常激动，彻夜难眠。但这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在法国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944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1945年春，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解散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研究所。这年冬天，常书鸿告别工作了3年的敦煌，带上一双儿女，到重庆奔走呼吁。经过近一年的四处奔走，在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批准下，恢复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拨发卡车一辆、物资若干。1946年6月，他带领从重庆新聘的一批艺术专业大学生，购置了图书、绘画器材及生活必需品以及备用3年的临摹壁画物资，返回了敦煌。在面对被破坏的敦煌艺术瑰宝，他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对敦煌石窟进行保护和研究。先对壁画进行临摹工作，通过临摹学习掌握古代绘画的技法，传达敦煌壁画的真实韵味，给壁画留下副本。然后对洞窟进行清理和编号，1947年冬至1948年春，对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进行全面编号，梳理出492个编号洞窟，2415尊塑像，编选出十余个壁画专题，选绘壁画800余幅。

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创作油画《走向莫高窟》；1950年冬，将历年完成壁画摹本带往北京展出，并取得成功。1951年，又在印度新德里、孟买和缅甸曼德勒等举办了“新中国建设成就展览”“敦煌艺术展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对莫高窟南段窟区崖壁、栈道进行了加固，对洞窟重新进行了合理科学的编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0余年间，敦煌壁画的临摹品分别在国内外8个城市和国外6个国家的11个城市展出，向世界介绍敦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敦煌艺术深入人心。他还注重对敦煌艺术人才的培养和吸收，先后培养和吸收了董希文、张琳英、乌密风、周绍森、潘浩兹、李浴、范文藻、常沙娜、段文杰、史维湘等一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造就和总结了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临摹方针。“文革”期间，常书鸿和研究所的工作，都受到了巨大冲击，研究工作被迫终止，不少研究人员被下放到农村或遣送到原籍劳动，但是他和同事们艰难地捍卫着莫高窟，为之献身的信念矢志不渝。1982年后，他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94年6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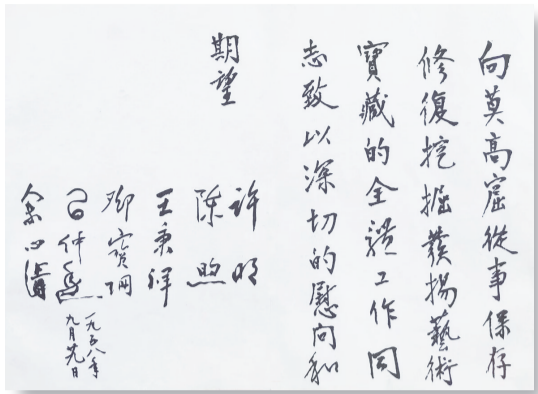
其主要作品有壁画临摹《鹿王本生》《萨陲那本生》《须达太子本生》《四飞天》等；油画有《莫高窟下寺外滑冰》《野鸡》《古瓜州之瓜》《雪后莫高窟风景》《雪后大佛殿》《榆林窟风景》《刘家峡水库》等；撰写文章、论文、文集有《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敦煌壁画艺术》《敦煌艺术》《新疆石窟艺术》《常书鸿画集》《常书鸿文集》《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等。

常书鸿一生所爱，只在敦煌。从1943年到达敦煌，到1982年迁往北京，在敦煌长达40年的时间里，他倾注全力献身于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与保护事业。



永不褪色的敦煌题词

□ 杨维军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但执政者、决策者面对过热政治氛围、较急重经济建设任务、以吃饱肚子为主的时代背景，能真正考量到这一点，并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非有远见卓识、战略思维和担当精神而不能为。《南梁之光》文献电视片中，5次出现西安古城墙镜头。这座历经600多年沧桑岁月、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建筑，正是由于习仲勋同志等人多次倾力救护，才得以存留并被保护下来。第一次，1950年，西安市提出拆除古城墙的计划，时任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同志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集体办公会议进行研究，在听取大家意见后，他认为不但不能拆除城墙，而且要予以保护。随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的名义，发出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西安古城墙得以幸存。第二次，1958年，由于错误的方针路线等因素，西安市委向陕西省委提出拆除西安古城墙的请示，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也原则上同意了关于拆除西安古城墙的意见，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同志接到有关方面反映后，明确批示西安城墙不能拆除，并多方协调国务院发出《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督促陕西省和西安市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西安古城墙。

1961年3月4日，西安古城墙和敦煌莫高窟等文物保护单位一道，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隔63年后，“敦煌女儿”樊锦诗先生在文献电视片中说：“据我知道，周总理委托安排给习仲勋秘书长来管这个事，公布了以后，很快派出了一批专家去划保护范围，由国务院派专家来划，对保护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三次，1981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852期刊登的《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遇到严重破坏》一文上批示，安排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出面协调解决相关问题，推动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工作从此走上正轨。

古籍是前人留下来的瑰宝，敦煌文献、遗书、文书、写本等古籍，是敦煌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籍出版社的成立也离不开习仲勋同志的支持，1954年2月，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同志在国家出版总署关于成立古籍出版社报告上批示：“为了保存与整理中国文化遗产，团结一部分学术研究工作，建立这样一个出版社是很必要”。这一批示，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第一个文件。这个批示及其后中央有关职能部门出台的系列文件和举措，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新开端，意味着自晚清以降由个体或少数团体所从事的古籍整理，进入了政府层面有组织、有计划、有章法的阶段，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和对从业者的关怀。

如今，敦煌正在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西安古城墙已成为中国历史的缩影和文明古国的象征，古籍出版社也发展成为整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重要平台载体，东方雕刻艺术瑰宝麦积山石窟正焕发出新的时代魅力，它们都为我国文物事业发展乃至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着独特力量，而这些都与习仲勋同志当年的工作有着关系。



敦煌石窟誉天下 艺术瑰宝展方寸

□ 周洪林



敦煌宋云

——比玄奘还早的西行取经人

□ 钱国宏

由于受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深远影响，人们一直将“西天取经人”锁定在“唐僧玄奘”身上。其实，通过查阅史料得知，玄奘高僧并非最早西行取经之人，在他之前，有两人先后西行取经：法显、宋云。法显西行比宋云早110年，宋云西行又比玄奘西行早约110年。

官派西行求佛法

北魏是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政权，推行汉化政策，促进民族融合，北魏王朝历代统治者尊崇佛法，提倡佛教活动，一时间大兴庙宇，开窟造像。不仅修建了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等石窟，皇帝还亲自出面召集名僧，讲解佛经。而此时掌权的大后胡充华，在她的提倡下，洛阳修建了500多所佛寺。由于教派众多，对佛经的解读各说其是，各取所需，难以统一，这就需要到佛教的发源地找一个正统的说法，即所谓到西天求取真经。这是一桩博取佛教徒拥戴的盛事，更是确立自己在佛教界正宗地位进而巩固统治的重要举措。胡太后决定派宋云、慧生一行人前往天竺求取真经。同时为宣扬国威，结好诸国，还给沿途各国写有公文诏书，并携带“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向所经国、乌菟、乾陀罗（健驮罗）等国家赠送。这便是宋云“西天取经”的主要缘由：求取佛经，联谊诸国。

历尽磨难书壮举

宋云，敦煌人氏，北魏明帝时在洛阳闻义里皈依佛门，后任“僧统”（管理僧侣的官员），故而，他才有机会官派随队前往天竺取经。公元518年11月，宋云同慧生、法力等僧众从洛阳出发，经过陕西长安、甘肃兰州、青海西平，翻越日月山，进入柴达木盆地，走吐谷浑古道，入鄯善，过左末城，沿昆仑山北麓越葱岭（帕米尔高原），经瓦罕走廊（今阿富汗东北）至白沙瓦（今巴基斯坦境内）一带。一路上历尽艰险，数度濒临绝境，但都被宋云一一化解。其状如他所载：“葱岭高峻，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冷，北风驱雁，飞雪千里。”沿途，凡经历一国一地，宋云都详细记载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如他们在经于阗国（今和田）时，曾作如下记载：“王头著金冠似鸡冠，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弓箭一具，戴二枚，褰五张。左右带刀不过百人。其俗妇人裤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屠。居丧者剪发髻面以为哀戚，发长四寸，即就平常，惟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这段记载说明佛教在当时的于阗大受崇信，还反映出中原僧人不断来到于阗，中原与于阗之间的佛学交流非常频繁。

返洛著述遗珍篇

公元522年2月，宋云一行历时5载，历经千难万

险，游历数十国，带着170部大乘佛经等数量庞大的经卷返回洛阳，完成了使命。今天，在河南登封少林寺的碑廊中，有一块名为“达摩只履西归圆碑”，上面刻有“达摩入灭太和年，熊耳山中塔庙全。不是宋云葱岭见，谁知只履去西天”的七言律诗，写的就是北魏高僧宋云西行求法经葱岭返京洛阳时遇见达摩（北魏著名禅师）拄杖执履赤脚西去的故事。回到洛阳后，宋云撰有《家纪》，慧生撰有《行纪》，记录了他们此番西行的经历和见闻。可惜，这些著述大多散失，幸好有宋云同时代的抚军司马杨街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综合收录了宋云等人西行的记述，后人将这些著述编撰成《宋云行纪》。《宋云行纪》不仅记述了当时从中原前往天竺的交通路线，还对沿途国家、地区的地理物产、社会政治、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等进行了翔实的记述。法显、宋云、玄奘是中国古代三大西行高僧。法显西行比宋云早110年，宋云西行又比玄奘西行早约110年。法显的《佛国记》、宋云的《宋云行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三本记述，在时间上前后联系，可以系统地了解中亚等地的历史地理，在世界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成为后人了解西域各国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交通、风俗文化的宝贵历史资料。宋云毫不亚于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事迹，在1500年前，对促进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